



中外文明史比较研究丛书

和早期拜占庭 查士丁尼 时代研究

徐家玲 / 著

ZAOQI
BAIZHANTING
HE CHASHIDINGNI
SHIDAI YANJIU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中外文明史比较研究丛书

早期拜占庭和 查士丁尼时代研究

徐家玲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长春

(吉)新登字 12 号

东北师范大学文库
中外文明史比较研究丛书
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
ZAOQI BAIZHANTING HE
CHASHIDINGNI SHIDAI YANJIU
徐家玲 著

责任编辑:薛红梅	封面设计:魏国强	责任校对:许玲玲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38 号)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发行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制版 (邮政编码:130024)	吉林省吉新月历公司印刷分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印张:11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00 千	印数:001 — 300 册	
ISBN 7 - 5602 - 2194 - 7 /K · 126	定价:15.00 元	

序 言

在徐家玲博士的世界史专著《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即将出版之际，我想起 15 年前的一段往事：从国内外历史学的实际情况出发，从我国建设的实际需要着想，我校历史学的世界上古史、中古史学科确定了十六字发展方针：“避强趋弱，去热就冷；发展比较，填补空白”。简单地说，就是不往国内研究的强项和热点领域里挤，着重填补空白，加强薄弱环节，开展比较研究。为此，或引进国外智力，建立新的学科，或派人出国留学，培养空白学科的人才。徐家玲正是为了填补拜占庭学的空白才被派往希腊留学的。十几年来，她对拜占庭学情有独钟，不畏险阻，克服万难，锲而不舍地在此学科领域里默默耕耘；如今已经升堂入室，开花结果。真可谓：“多情唯有是春草，年年新绿满芳洲。”

这部研究成果是徐家玲多年心血的结晶。认真读过之后，感到颇有新意，至少有以下三点应该着重指出：

首先，这部拜占庭学专著的问世为我国世界历史学填补了这个学科的空白。拜占庭帝国是中古时代横跨欧亚非三洲交界处的一个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高度发展的文化遗产。它既是古典希腊文化的发祥地，又是古罗马政治体制的继承者，也是中世纪希腊正教的传播者。本书称之为“三位一体的产物”是恰如其分的。拜占庭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功不可没。无论对东欧西亚处于半野蛮

状态的民族走向文明，还是对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文化的繁荣，对西欧文艺复兴的产生，都起了促进作用，做出重要贡献。国际学术界对拜占庭学的研究发展迅速，成果斐然，再加上文献的整理和考古的发现，可谓“汗牛充栋”。可是我国历史学界对拜占庭学的研究极为薄弱，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今天徐家玲即将出版的关于早期拜占庭的历史专著，实际上是一部拓荒之作，对于我国拜占庭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本书着重地研究了拜占庭从古代奴隶制向中世纪封建制过渡的历史特点。作者从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多方面多视角地考察了早期拜占庭帝国的特性，突出了它逐渐地脱离古代向中世纪过渡的属性。书中指出：3世纪危机以后，特别是在君士坦丁以后，隶农制生产方式在罗马-拜占庭世界已经居于生产的主导地位。大地主将土地分成小块，租给具有自由人或半自由人身分的隶农耕种，并向他们征收一定的代役租。一些使用奴隶生产的田庄，也按照罗马法的规定将土地财产分授与奴隶经营，向其征收一定的代役租。这种授产奴隶制与隶农制甚为近似。恩格斯认为，罗马的隶农是中世纪农奴的先驱。隶农制实际上是在奴隶制社会母胎内孕育的封建制生产方式的萌芽。书中概括地说：“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经济体制是处于一种过渡状态，其中既有旧世界的基因，也有新时代的细胞。奴隶制度的瓦解和新的封建因素的产生是同时发生的。”作者将拜占庭向中世纪过渡这一“渐变”模式与西罗马被蛮族征服而产生的“突变”模式作了鲜明对照，说明在世界历史上由古代向中世纪转型并非只有“暴力变革”一种方式。

最后，本书对6世纪有争议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及其时代进行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了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作者指出：“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们，在涉及查士丁尼的对外征服活动中，往往持否定意见者居多，认为他的统一活动是得不偿失的愚蠢之举。但是，如果把查士丁尼的活动与远东的中国相比，人们也许会得出

不同的结论。事实上，自4—5世纪蛮族给亚欧几大古典文明区带来的浩劫成为回忆以后，东西方世界的各个民族中都出现了致力于帝国统一的杰出历史人物。中国的统一，则在查士丁尼之后30余年。”作者把查士丁尼放在当时的历史时代里进行观察，从而理解他的行动带有那个时代的共同特点。

书中对查士丁尼时代的观察，完全脱离了所谓“复辟反复辟”的旧框架，认为它是拜占庭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既是地中海古典世界历史的最后一页，又是“开始透露出新时代气息”的历史阶段。书中指出：“查士丁尼时代的地中海帝国是当时亚欧非已知世界最伟大、最文明、最繁荣和富强的帝国。……君士坦丁堡位居亚欧重要商路中心的地位，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荣的商业贸易中心，来自世界各地的操不同语言的商人云集于此，交换着来自天南地北的信息和远渡重洋泊来的商品。”

本书对查士丁尼及其时代的论述，有新的“突破”和进展。事实分析有根有据，理论观点平实可靠，研究视角新颖全面。读起来颇受启迪。如果说它还有什么不足的话，我认为有些忽视对此时期拜占庭文化的研究。查士丁尼时代素有拜占庭文化的“黄金时代”之称。拜占庭上承希腊罗马，下启欧亚非诸国诸族，在历史上和地理上有重要地位。没有拜占庭文化的存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繁荣，将难以想象；没有拜占庭和阿拉伯文化的存在，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难以逆料的。拜占庭文化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占据十分显要地位。如果以后有机会修订时，可否将这个缺憾补上。

岁次戊寅，时届清明，冬威欲尽，春意盎然，为贺梓付，遵嘱为序。

朱 寰

目 录

序 言/1

导 言/1

第一章 危机与复苏——古典世界的衰亡和拜占庭的奠基/18

- 一 罗马世界的形成/18 二 3世纪危机/22 三 改革与生存/32
- 四 新的起点/41 五 “新罗马”的奠基/45 六 基督教的胜利/52

第二章 继承与发展——从罗马世界到拜占庭世界/57

- 一 王权的演变/58 二 执事长官制度的形成/61 三 执事长官的职权范围/64 四 执事长官制度的社会基础/66 五 帝国财税管理的三元化体制/69 六 帝国皇产司的兴衰/70 七 管理国家财政的“圣库”/76 八 大区总督的税收职责/81

第三章 野蛮与文明——地中海世界帝国的分裂/86

- 一 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的早期交往/86 二 匈奴人的西侵/91
- 三 罗马帝国的经济衰落/93 四 民族大迁徙和罗马世界的瓦解/95
- 五 东方帝国的生存/99

第四章 冲突与协调——早期拜占庭宗教争论和政教关系/107

- 一 早期拜占庭时期基督教会的教义争论/108 二 关于阿里乌派的争论/109 三 关于聂斯脱利派的争论/111 四 关于一性派的争论/114 五 早期基督教会争论的原因/117 六 宗教争论带来的后果/125

第五章 复苏与转轨——4—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132

- 一 阿那斯塔修斯的统治/132 二 罗马-拜占庭帝国封建因素的产

生和发展/137 三 对早期拜占庭新经济因素的认识/144 四 拜占庭帝国的贸易和城市/148 五 拜占庭经济复苏的原因/151

第六章 形成与巩固——查士丁尼时代与6世纪的亚欧世界/156

一 查士丁尼和所谓“查士丁尼时代”/157 二 查士丁尼帝国和6世纪的亚欧世界/164 三 以查士丁尼为核心的统治集团的形成/167 四 查士丁尼的总体战略目标及其理论根据/175 五 尼卡起义和查士丁尼政权的巩固/177

第七章 宗教与外交——查士丁尼的和平路线/181

一 查士丁尼的政教关系理论/182 二 对异端、异教的政策/184 三 “一性派”之争；查士丁尼与罗马教会/187 四 对波斯的战争/192 五 外交、国际关系和贸易/197

第八章 征伐与“复兴”——实施“一个国家”的目标/204

一 查士丁尼对西方政策的理论根据/204 二 对北非汪达尔人的战争/207 三 对西班牙西哥特人的战争/210 四 对意大利东哥特人的战争/211 五 对查士丁尼西征的历史评价/223

第九章 立法与建筑——查士丁尼时代的建树/228

一 查士丁尼以前罗马的法制传统/229 二 查士丁尼的立法活动/232 三 查士丁尼的立法与行政、财政改革/235 四 查士丁尼的立法与社会改革/243 五 查士丁尼的建筑活动/247

第十章 内忧与外患——查士丁尼的晚期统治和危机四伏的拜占庭世界/253

一 查士丁尼的晚期统治/253 二 巴尔干半岛的危机/257 三 542—543年的大瘟疫/261 四 查士丁尼之死/263 五 查士丁尼之后的拜占庭世界/265 六 新的行政管理模式——总督制/268

结 语/270

主要参考书目/279

一 西文部分/279 二 中文部分（含译著）/288

附 录 早期拜占庭研究的拉丁文、英文词汇对照表/291

后 记/333

导 言

查士丁尼是早期拜占庭帝国的皇帝(527—565年在位)。在从古罗马帝国向中世纪拜占庭帝国演变的历史过程中,查士丁尼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当代西方史学家们普遍认为,查士丁尼时代完成了自古罗马帝国向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转变。但这种观点在我国史学界尚未被广泛接受。在论及查士丁尼时,我国学者往往强调他对古罗马传统的继承和“复辟”,特别对他的西征活动颇有非议,认为这是他为了恢复古罗马奴隶制帝国而做的一次最得不偿失的蠢事。虽然人们对于查士丁尼的立法活动和建筑艺术上的成就基本给予了肯定,但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还没有机会对查士丁尼对古罗马帝国传统的发展和为新时代奠基的客观作用作一公允的评价。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综合评价查士丁尼及其时代,是我国世界史学者在世纪之交应该解决的重要课题。

由于查士丁尼及其时代的特定性质,历代西方学者无不对查士丁尼本人倾之以非凡的热情。加之查士丁尼皇帝和他的皇后在他们那个时代的方方面面所表现出的戏剧性情节,和普罗科匹厄斯在其《秘史》中不无夸张地揭示的那些鲜为人知的宫闱生活的秘密,曾激发了古往今来许多文学家、戏剧家们的创作热情。因此,描写查士丁尼和他那个时代的历史文学作品,揭示查士丁尼和他的皇后之宫廷生活,他们在政治上的一致和宗教上的对立与冲突,查士丁尼、提

奥多拉和他们的大将军贝利萨留的生活和业绩以及他们两对夫妻之间的特殊关系的文学、戏剧作品也是相当丰富的。这些也使现代人更有兴趣重新认识和评价查士丁尼及其时代,同时,向有志于早期拜占庭研究的当代学者提出了一个颇为严肃的课题。

中国有句古话:“时势造英雄。”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的评价离不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任何人的思想、行为都不会超出他那个时代对他的限制。因此,要真正了解和正确评断查士丁尼,不可不回顾一下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把他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就是4—6世纪的罗马-拜占庭世界。

拜占庭,我们习惯于称它为“东罗马帝国”,它是在古代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因它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就坐落在古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Byzantium)的旧址上,所以,近现代研究者们称这一帝国为拜占庭。

据历史记载,在古希腊移民大潮冲击下,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麦加拉人远渡爱琴海,到达了亚欧相交处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们在海峡两岸先后建立了卡尔西顿(Chalcedon)和拜占庭两个城市,并以他们的远征队首领拜扎兹(Byzas)的名字,把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隅的新城命名为拜占庭。建城不久,拜占庭就成为东地中海和黑海地区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要地。罗马帝国征服巴尔干和小亚细亚及东地中海地区以后,由于连年战乱的破坏,拜占庭城陷于衰落不堪的境地。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皇帝重新统一了罗马-地中海世界之后,决定在帝国东方建立新的首都,并选定了拜占庭作为新都的城址。此时,这座古城已经沦为一个小小的渔村。建都工程从325年开始,330年粗具规模。是年,君士坦丁正式把罗马-地中海帝国的首都迁至拜占庭古城,以自己的名字更其名为“君士坦丁堡”,即君士坦丁之城;同时宣布它是“新罗马”即帝国的新都。虽然,君士坦丁重新统一罗马-地中海帝国以后,没有继续实行戴克里先时期确定的在东、西

方各设一名到两名副帝（奥古斯都或凯撒）“共治”的体制，但他保留了罗马城作为罗马帝国首都的原有地位和元老院及城市管理体制的结构，只是改称其为“旧罗马”，以同新建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相区别。在他逝世前，君士坦丁放弃了戴克里先在自己的臣僚中间选择继承人的方法，在自己的三个儿子中间分割了帝国的统治权。此后，罗马-地中海帝国继续了戴克里先时期的“四君共治”体系。直到476年，西部罗马帝国的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被他身边的蛮族将领奥多亚克废黜，学者们通常认为这一年是“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标志。不久，整个西部帝国土崩瓦解，被许多蛮族小王国所瓜分，以东都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地中海罗马帝国却存续下来，直到1453年，后人称之为“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但是，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人们通常还保留着当年罗马帝国之大一统天下的记忆。因此，至少到查理大帝称帝时（800年），地中海文明区各民族人民还始终认为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是罗马帝国的真正代表；甚至迟至1453年，这个帝国的皇帝和臣民们还一直以“罗马皇帝”和“罗马人”自居。因此，“东罗马”和“拜占庭”这样的名称只为后人所用，却从来不被当时的人们所承认^①。

拜占庭这一名称开始被学术界所采用，是在16世纪的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史料编撰和整理者热罗姆·沃尔夫（Jerome Wolf）在整理出版拜占庭历史资料时第一个使用“拜占庭”来称呼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帝国。后来，在路易十四赞助下，法国卢浮宫出版了由许多法国学者合作编辑的《拜占庭历史资料大全》后，“拜占庭”这一名称正式成为学术界的专门术语^②。此后，“拜占庭学”成

① G. 奥斯特罗戈夫斯基（G. Ostrogorsky）：《拜占庭国家史》，约安·赫西（Joan Hussey）译，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26页。

② A. 瓦西列夫（A. Vasiliev）：《拜占庭帝国史》，第1卷，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4—6页。

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在西欧、北美乃至俄国迅速发展起来。

虽然，对于拜占庭的最后灭亡时间（1453年），中外史学家从未有过异议，但是，对拜占庭帝国的起始年代，学术界却没有取得过一致的意见。综合国内外各派专家学者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认识：

首先，有一派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的上限应该定于395年，因为在这一年狄奥多西逝世，他的两个儿子分治帝国的东、西两部。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次分离后，东、西罗马世界就未曾统一过，因此，从这一年起，罗马帝国已分裂为东、西两大部分，于是这一年应该是东罗马，即拜占庭历史的开端。持此意见的代表者，有美国著名中世纪学者J. W. 汤普逊，法国拜占庭学者L. 布莱耶尔，苏联学者列夫臣柯，当代美国学者A. 杰罗斯特尔吉奥斯等。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种观点在我国居统治地位。著名罗马-拜占庭研究专家英国学者J. B. 伯里虽然在其《晚期罗马帝国史》中强调君士坦丁皇帝是拜占庭帝国的奠基人，但是，为了强调罗马世界与蛮族世界的斗争和冲突，他也从395年开始记载东方帝国——拜占庭的相对独立的历史。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反对罗马世界曾经分裂为两个帝国，他们强调“罗马地中海帝国”的大一统观念始终存在于整个中世纪，而且，自戴克里先以来，罗马帝国一直保持着东、西方分治的传统。甚至到查理大帝时期，西方世界也没有否认拜占庭作为罗马帝国正统继承者的地位，因此他们强调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历史的延续，从而把4世纪初，即君士坦丁时期作为拜占庭历史的开端。但是，持此观点者，对于究竟以哪一年为拜占庭历史的开端，仍有不同意见。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以君士坦丁重新统一地中海罗马帝国那一年，即324年为拜占庭奠基的开始，因为从这一年起，君士坦丁中止了“四君共治”传统，在戴克里先改革基础上重建了罗马-地中海世界帝国，并决定以基督教作为统治这一帝国的精神支柱，同时将帝国的行政管理中心东移。支持这一派理论的

本世纪著名拜占庭学者有美国的 A. 瓦西列夫, 南斯拉夫的 G. 奥斯特罗戈尔斯基以及当代希腊的 J. 卡拉扬诺布鲁斯和 A. 赫里斯托菲洛布鲁。但是, 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君士坦丁迁都之时, 330 年应该是拜占庭历史的开端。其主要代表有《世界文明史》的作者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拜占庭文明》的作者英国学者 St. 任西曼和《拜占庭帝国史》的作者, 法国学者 Ch. 第尔以及《剑桥中世纪史》的编者 J. B. 伯里等。

从原则上说, 这两派的意见没有大的分歧, 只是后一派学者更重视“帝国首都”在东方建立这一历史性事件, 尽管他们并不否认, 建立新的都城于帝国东方博斯普鲁斯海峡, 是自晚期帝国以来一系列历史变化和政治改革发展的结果^①。这种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在中外历史研究领域都很常见, 如中国划分东、西周, 东、西晋, 前、后汉, 南、北宋各时期, 都是根据首都的位置变化来确定的。在涉及地中海罗马世界的历史时期划分时, 上述原则当然也有其合理的方面。但是, 如果考虑到罗马-拜占庭世界之历史的延续性和君士坦丁皇帝之政策的连贯性, 应取 324 年作为拜占庭历史的开端。因为, 从这一年起, 君士坦丁的一系列“重建”帝国的政策开始实施, 并在短期内改变了罗马-地中海帝国的面貌。

第三种意见认为, 476 年罗马城的沦陷和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被废, 意味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 因此, 与之相对的“东罗马”的独立历史由此开始。但是, 持这一派意见者多是从从事中世纪史研究的专门学者, 他们无意于研究自罗马到拜占庭时期的演变是什么时候完成或怎样完成的, 而只是特别关注地中海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衰落后发生的变化。这一派意见的主要代表者有法国学者布瓦松纳、《世界史纲》的作者英国学者 H. C. 韦尔斯及《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英国学者爱德华·吉本等。严格地说,

① St. 任西曼 (St. Runciman):《拜占庭文明》《前言》, 伦敦 1959 年版。

这一派学者也从来不同意隔断历史，把罗马时期和拜占庭时期分为截然对立的两个毫不相关的历史单元，只是更强调蛮族入侵在改变地中海世界历史方面的作用。

综上所述，笔者倾向于以 324 年，即以君士坦丁皇帝重新统一罗马-地中海世界这一年作为拜占庭历史的开始。在阐明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强调对传统上的历史分期研究方法的基本认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所谓的世界和世界历史的形成是在近代地理大发现之后，此前的世界，只是民族和地域的历史按照自己的模式分别独立发展并在不断的交往和冲突中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过程，恰如江河之流归于大海一样，这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交汇的过程，没有中断，也没有什么永远不可逾越的屏障。因此，研究历史，主要是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各地区、各民族、各种族历史的演变和它们之间的交汇和融合，而不应该机械地把活的历史人为地分割为几个“板块”。但是，历史学者们为了便于对各民族、各地区多元性的历史和复杂的发展过程进行研究时的方便，已经习惯于采取划分历史时期的方法，因此，对于前人的分期方法加以研究、探讨，并找出使之得出不同结论的主要理由加以综合分析，从中找出某些真正规律性的东西，才是现阶段对待传统“历史分期”的正确态度。

上述几种分期方法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认识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从罗马时期到拜占庭时期是以历史的继承、延续和发展为主流还是以中断或分离为特点？罗马-地中海世界究竟有没有发生过“分裂”？如果发生了“分裂”，其原因是什么？是来自“外部”因素，还是来自“内部”因素？长期在中世纪欧洲世界保持着其旺盛生命力的“罗马-地中海大一统”观念产生和存在的依据是什么？它在中世纪欧洲政治生活中，尤其是在决定西方各封建君主国与罗马教皇、拜占庭皇帝之政策取向的问题上起到了什么作用？要说明上述问题，必须简单回溯一下“前拜占庭”时期，即自罗马帝

国 3 世纪危机以来罗马-地中海世界的深刻历史变化。

所谓罗马帝国“3 世纪危机”，其实质是奴隶制度的危机，中外学者对于这一结论并无疑义。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一危机在地中海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究竟带来了什么变化？是否引起了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以戴克里先改革为标志的晚期帝国，究竟构架于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之上？3 世纪的危机，给罗马-地中海帝国带来的变化是决定性的，它促进了奴隶制度的瓦解和以小生产与租佃制度为主体的早期封建关系的产生。它破坏了罗马奴隶制大帝国各地区的联系和奴隶制的商品经济，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帝国经济生活的主导。3 世纪危机以后，帝国政府加强了对于帝国各地区各阶级人民的超经济强制，戴克里先的帝制改革就构架于这一基础之上。戴克里先之后，君士坦丁经历了与其他权力集团的长期角逐，于 324 年重新统一了地中海-罗马世界，进一步深化了戴克里先改革的内容，并以承认基督教和迁都于帝国东方希腊化地区的举动，完成了将古典的以多神崇拜为其精神支柱的罗马奴隶制帝国改造为以新兴的基督教为其精神支柱的，以小生产者 and 自由租佃农为主体的早期拜占庭帝国。虽然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在君士坦丁时期拜占庭帝国已经确立了封建制度，但是至少可以说，自君士坦丁以后，封建制因素在罗马-拜占庭世界开始稳步发展，正在取代古典时期的残酷而落后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因此，自君士坦丁重新统一罗马-地中海帝国以后，其名称没变，仍然是“罗马帝国”；其人民使用的基本语言没变，仍然在西方以拉丁语为主，在东方以希腊语为主；其首都的名称不变，仍然叫做“罗马”，只是自帝国的西方迁移至东方，并在其前面加了一个“新”字，以示与古代罗马相区别。东西方新旧都市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共和时期遗留的元老院和城市库里亚体系也保持不变，但是，元老们的出身背景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是早期帝国时代大奴隶主阶级的代表，而演变成新兴官僚阶级的代表。他们虽然也是大地主，但已经放弃

了奴隶制的剥削方式。这种变化在帝国的东方更为明显。随之而来的，是在其经济生活结构和阶级结构方面，在皇权的更加集中和专制方面，在其新的宗教组织逐渐取代旧的传统宗教的势力方面，在其行政、官僚和军队体系方面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最后，传统的“罗马帝国”只余一副躯壳，其内部已经完成了本质的变化，只待条件成熟就会脱壳而出。君士坦丁时期（324—337年）的统治就是这一长期演变过程的开始。

其次，虽然戴克里先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措施——实行“四头政治”，或曰“四君共治”体系，采取了对罗马-地中海世界分而治之的方针，但是，所谓“罗马世界”（*orbis romanus*）的概念却一直存在于整个罗马-拜占庭早期历史中。在戴克里先的改革活动中，最典型的是他的帝制改革：他摒弃了自奥古斯都以来确立的传统的罗马皇权观念，不再自称元首（普林西斯），而改称君主（多米努斯）；不再强调“君权取自于民”的原则，而强调“君权受命于天”，并通过一系列宗教礼仪和宫廷仪式弘扬这一原则，将皇帝与平民隔离开来。凡罗马公民欲面见皇帝，必须行跪拜礼，只有少数权贵在得到准许时才可以吻皇帝长袍的边。帝国的高级官员成为皇帝的私人臣仆，而不再是公民意志的代表，皇帝在他们的官阶之上冠以“神圣”的字样，如司掌财务的官员被称为“圣库掌管者”（或称“圣库伯爵”），帝国议会被称为“圣议会”或“御前会议”，以强调他们与皇帝个人的关系。皇帝的露面也成为真正的宗教盛会，绛红色的丝绸袍服成为皇室的象征和皇权的标志；镶饰着宝石的皇冠则代表着皇权的至高无上^①。但是，戴克里先没有从此建立一个人的绝对独裁，而是在他的三个“共治者”中间分割了帝国的统治权，他在帝国的东方和西方分别设两名奥古斯都和两名恺撒，分别以一处战略要地为自己

①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文版，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4—245页。

的驻节地，各自管理帝国的四个不同地区。为了保持皇室的一致性，在理论上，两位奥古斯都被认为是兄弟（当然是以戴克里先为主），而两位恺撒则分别是他们的儿子，并以联姻方式使奥古斯都和恺撒们建立了血统联系，以防止帝国被分割。在理论上，四位统治者是完全一致的，所有法令皆以四人的名义联合签发。这个由多位皇帝分别统治一个庞大帝国的模式，一直延续到 476 年。在 476 年之后，这一传统则成为拜占庭东方皇帝选择储君和摄政者的一种常用方式。所以，从早期拜占庭时期人们的观念看来，帝国东、西方的分区，只是“分治”，并不具备“分裂”的性质。而且，东、西方皇帝在法律和政策上的协调和互相支持也一直存续于“分治”期间。不过，从实质上看，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民族的原因，东西方帝国之间的分歧本来就有，而且在两君或“四君”分治期间呈逐渐扩大的趋势。它们的“分裂”本来是不可避免的，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而已。总之，罗马-拜占庭世界是一个形似统一，实则分裂的世界，但是，有一股传统的力量一直在小心地保护和维持这一形式上的统一，此即“罗马-地中海统一帝国”，“罗马世界”的传统思想。

关于“罗马世界”思想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基础，本书在以下一章还要详加论述，此不多赘。这里要强调的是，这种统一思想的存在，使君士坦丁以后，直到 476 年以前，罗马-地中海世界的各族人民，无论处于什么地位，是受压迫者还是统治者都执著地相信，地中海罗马世界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地中海-罗马世界的皇帝是唯一有权力统治他们的最高领主。因此，西方各蛮族国家在建立其相对自治的统治时，无一例外地要求得到东方罗马皇帝即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承认，即使在 476 年，西方首都的蛮族首领奥多亚克在废除了最后一位“西罗马”皇帝罗慕洛·奥古斯都后，也请求东